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DE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德能”文化沙龙

第三期

德州历史文化名人“德能”思想研讨

2021年10月

“德能”文化沙龙

第三期

德州历史文化名人“德能”思想研讨

2021年10月

目录

前言.....	1
董仲舒 李金甫.....	3
东方朔 康荣峰.....	7
窦建德 付吉军.....	11
颜真卿 史兰芳.....	16
李之仪 李东筱.....	21
邢 侗 吴朝辉.....	27
田 雯 王婷婷.....	31
卢见曾 高文英.....	35
宋哲元 宋晓丽.....	39
任继愈 高天宇.....	43

前言

“德能”文化由德州职业技术学院率先提出，确立了“崇德尚能、敬业乐群”的校训，铸建了标志性建筑“德能鼎”。“德能”文化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崇德尚能、以德为先、德能兼修、德能并进。崇德尚能是理念，以德为先是根本，德能兼修是过程，德能并进是目标。

“德能”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之所以在全国能率先提出“德能”文化理念，是与对德州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弘扬是分不开的，对德州历史名人的“德能”思想的研究与探索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2021年10月21日，学校传统文化研究会“德能”文化研究室以“德州历史名人的“德能”思想的研究”为主题，组织了一期（总第三期）“德能”文化沙龙活动。

李金甫、康荣峰、付吉军、史兰芳、李东筱、吴朝辉、王婷婷、高文英、宋晓丽、高天宇十位同志分别对在德州历史上工作、生活过的实绩突出、影响较大的董仲舒、东方朔、窦建德、颜真卿、李之仪、邢侗、田雯、卢见曾、宋哲元、任继愈等十位代表人物的“德能”思想进行分析与研究，卓有见地地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现将十位教师的发言汇编成册，为探究与传承德州历史名人的“德能”思想提供材料，以期给读者启迪和教益，尤其是给高职学生以“德能”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帮助其早日成长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董仲舒

李金甫

董仲舒(约公元前 179 年-前 104 年)，西汉广川国(下辖现在的德州，现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著作有《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他年少勤奋学习，熟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无论进退举止，遵守礼仪，时人师尊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所采纳。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 10 年；因言灾异之事，宣扬天人感应，触怒龙鳞，被罢免江都王相后，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公羊春秋》；汉武帝元朔四年(前 125 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 年后托病辞官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武帝尊重。公元前 104 年病故，享年约 75 岁。死后得汉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

经典故事：

一、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其父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

第一年花园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他手捧竹筒，只是摇头，继续看竹筒，学

孔子的《春秋》，背诵《诗经》。

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筒上刻写诗文，头都顾不上抬一抬。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之机，又找先生研讨诗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

二、传授儒学

董仲舒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他 30 岁时，开始招收大批学生，精心讲授儒家经典。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

董仲舒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儒学造诣很深，讲起课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相传，有个小男孩非常聪明，但是个聋子。他见同村小孩背着书包到董仲舒下帷讲诵的地方去上学很羡慕，跟母亲比划着说他也想去听课。母亲连连摇头，跟他比划道：“孩子，你是聋子，什么也听不见，怎么能听到先生讲课呢？还是在家干活吧。”可这个聋孩子很倔犟，又跟母亲比划说：“我想去听听，听不见就看先生的嘴怎么动，我回家再慢慢琢磨，能听懂多少算多少。”见聋儿非要上学，母亲心软下来，来到董故庄村拜见董仲舒。这位母亲一见董仲舒就跪下，含着泪说明

原因，恳请董仲舒收下聋儿。董仲舒连忙把聋儿的母亲扶起，答应道：“可以让他去听听，听懂更好，听不懂也不要紧。”聋儿得知董先生让他去听课，高兴的蹦起来跟母亲比划道：“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一定听先生的话好好学习。”第二天，他就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一同上学去了。聋儿一开始什么也听不到，光看见董仲舒的嘴动。但他不气馁，坚持听下来。久而久之聋儿一看董先生说话口型就知道个大概齐。聋儿跟着董仲舒学了好几年，竟也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邻村的一个哑巴孩子听说后，也缠着母亲要去听课。哑巴的母亲找到董仲舒，董仲舒也答应了。这位哑巴学生学习很刻苦，相传后来竟能开口读书了，还成了一名好学生。后人据此在董仲舒的塑像旁，塑了一个聋学生和一个哑学生，以纪念董仲舒在教育事业上为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

三、天人三问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正如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是在六艺之列的：“《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在现实举措方面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

“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用思想统一，统一法度、行为准则，进而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和国家统一。

四、规劝刘非

董仲舒对策后，被汉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

东方朔

康荣峰

东方朔（约前 161 年—前 93 年？），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汉武帝时期历任郎、常侍郎中、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善于辞赋，博学机敏，屡屡向汉武帝讽谏国政，曾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虽不得重用，但对汉武帝产生一定影响。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

对于东方朔的籍里，曾有过争议，但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多方证据证明，东方朔系今德州陵城区神头镇人。晋·夏侯湛在《汉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中这样写道：“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当时夏侯湛父亲为乐陵郡太守，夏侯湛到乐陵省亲，顺便由乐陵到压次瞻仰东方朔祠庙，“我来自东，言适兹邑”，可见厌次的位置在乐陵西面，即今天陵城区神头镇的位置。唐颜真卿在《碑阴记》中写道：“故厌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县东北二十二里。”安德县即今陵城区，陵城东北二十二里，就是陵城区神头镇的位置。神头镇北东西 5 华里、南北 2 华里的地面上有七十多个古墓（现存 38 座），经专业人士鉴定，该墓群为汉墓群，富平侯家族墓群，《后汉书》记载“厌次本富平”，此地西汉时称富平侯国，东汉时称厌次县。颜真卿所作《东方先生画赞碑》现存于陵城区文博苑中。2001 年 3 月，在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东街北邻，出土唐代咸亨三年（672）古墓一座，墓中出土墓志一方，有墓志铭：“公讳合，德州安德人也，汉大夫倩之二十八代孙。滑稽穷于炙輶，博辩轶于疏属，故得匡衡圣主、佐辅明时，垂裕后昆，流芳来世。”志文言墓主始祖为“汉大夫倩”，符合东方朔人物特点。

汉代的选官办法有两种：一是征辟，二是察举。征辟制度，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察举制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确立，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的一种制度。汉代还有一种特殊的“察举”方式，那就是自荐。

东方朔就是靠自荐，远离故土西往长安的，他年幼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家境虽然贫寒，但自小聪慧灵敏、刻苦好学，爱好儒家经术，广泛阅览诸子百家之书。汉武帝即位初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更是写了三千片竹简的内容上书，这些竹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武帝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有东方朔自荐书记载，上书曰：“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为了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东方朔极尽夸耀之能事，他用常人所没有的自信和勇气，描述自己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

由于不被重用，后来，东方朔恐吓侏儒，于汉武帝得些亲近。《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故意吓唬给汉武帝养马的几个侏儒，说皇帝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听后大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知道原委后，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回答说：“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

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于是汉武帝令他在金马门待诏。

武帝曾经让一些擅长占卜的术士射覆，射覆是中国民间近于占卜术的猜物游戏。在瓠、盂等器具下覆盖某一物件，让人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东方朔每次都能猜中，皇宫里有个受宠幸的伶人郭舍人不服气，他说：“东方朔太狂了，不过是侥幸猜中罢了，并没有实在的术数。我希望让东方朔再猜，他猜中了，就打我一百鞭；猜不中，就赐给我帛。”郭舍人的谜语，东方朔每每能应声就答，即使变化奇巧，机锋迭出，也没有谜语能难住他，人们都非常惊奇。皇上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于是得到武帝的喜爱宠幸。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喜好出游狩猎，由于一次出游需要好几天时间，路途休息不便，又会影响沿途百姓的生产生活，于是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东方朔向皇帝陈述了不能修建上林苑的三条理由，又列举了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太中大夫是一种不定员的谏官，约略相当于后来的监察御史。“给事中”属于加官，给事殿中供皇上临时差遣的意思。

东方朔有一次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此举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入狱，汉武帝又不想违背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内心异常难过。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东方朔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说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故以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后来，东方朔又举荐他的儿子做郎官，其子后升为谒者，经常奉汉武帝之命持节出使。东方朔临终前规劝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汉武帝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

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里的东方朔，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博学多才，下笔千言，出口成章，机智敏捷，滑稽诙谐，不拘小节。善于观颜察色逗人开心，但不卑不亢，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阴谋害人。常在武帝面前直言纠正皇帝一些过失，并以辞赋谏武帝戒奢侈。

忧国忧民是东方朔做事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那样一个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幽默滑稽也许是他本身的性格，也许是他与皇帝相处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特殊方式。东方朔举重若轻的处事哲学是人生大智慧，非凡夫俗子所能驾驭。后人由于敬佩东方朔的人格，崇拜他渊博的学识，把他誉为“智圣”，捧为岁星、桃仙子、滑稽大师、知识之星，推崇他为笑话、相声、谜语、占卜、俗文学的祖师爷。

窦建德

付吉军

窦建德（公元573年—621年8月2日），字建德，贝州漳南（隋开皇十八年改东阳县置漳南县，治河北省故城县东北故城镇，属贝州；唐武德七年徙治山东省武城县东北漳南镇，今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鲁权屯镇漳南镇村）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史称夏王。

窦建德出身扶风窦氏，东汉大司空窦融后代，辽东宣王窦拓玄孙。世代务农，自言汉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

早年经历

窦建德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

有一次一位邻居的父亲去世，但是家境贫寒，没有钱安葬。当时窦建德正在田间耕地，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便长叹不已，希望能帮助那个人。他自己身边也没有余财，便卖掉了自家的耕牛，换取钱财，帮助乡亲举行了葬礼。

还有一次有几个盗贼在晚上去窦建德家抢劫，窦建德站在门边，待盗贼进屋后，先后打死三人，其余的盗贼吓得不敢再进。只好请求将三人的尸首要回，窦建德说：“可投绳系取之”（《新唐书·窦建德列传》）。盗贼于是将绳投进屋里，窦建德将绳系在盗贼尸体上，然后让盗贼曳出，随即跃起持刀，再杀数人。

此后，窦建德当上了里长，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以回家。

窦建德父亲死的时候，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

举兵反隋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帝杨广征兵攻打高丽，窦建德应召入伍，被选为二百人长。

当时，山东发大水，与窦建德同县的孙安祖家被大水淹没，妻儿饿死。县令见孙安祖骁勇过人，也将他选入军中。孙安祖向县令陈述自己家中贫困，不愿入伍。县令大怒，处以鞭刑。孙安祖气极，杀死县令，投奔了窦建德。

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县城西南，旧为漳水所汇）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

孙安祖依计而行。随后，窦建德帮助孙安祖聚集贫困农民和拒绝东征的士兵数百人，占据漳南县东境方圆数百里的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举兵抗隋，孙安祖自称将军，号“摸羊公”。

当时，清河郟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余人，渤海蓓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率千余人在清河一带起义，往来漳南一带，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唯独不去骚扰窦建德所在的村落。郡县怀疑窦建德与他们私通，逮捕并杀害了他全家。

窦建德率麾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义军，正式起义。

众望所归

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杀害，其部数千人尽归窦建德。从此，势力渐盛，壮大到近万人，仍然往来

于高鸡泊中。

窦建德倾身接物、与兵士同甘共苦，所以士兵甘愿为其效死力。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隋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高士达认为自己智略不及窦建德，便以窦建德为军司马，让其指挥作战。

窦建德掌管兵权后，便提议由高士达留下看守辎重，自率精兵七千人前去抵抗郭绚。

窦建德设计，大破郭绚军，杀死俘获数千人，得到战马一千多匹，并将逃跑的郭绚斩首。

自此，窦建德所率义军兵威大振。

郭绚兵败后，隋炀帝又派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前来围剿起义军。

杨义臣于清河先歼灭了张金称的部队，由于杨义臣将所俘义军全部杀死，以至无人愿降，一些溃散在草泽中的残部相继投奔窦建德。

杨义臣又乘胜至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准备进入高鸡泊讨伐高士达部。

高士达不听窦建德之言，招致兵败身亡。

窦建德率百余人突围而去，到了饶阳县(今河北衡水市饶阳)，见没有防备，就攻占了城池，安抚城里的士民百姓，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又有了三千多人马。

杨义臣见高士达已死，领兵而回。

窦建德遂得以回到平原，收拾跟随高士达战死者的遗体，都掩埋好，还为高士达举行葬礼，全军穿起白色的丧服。又招集逃散的士卒，得到数千人，军队又重新振奋起来，窦建德开始自称将军。

起初，义军见到隋官及士人一律杀掉，唯有窦建德尽力争取并善待这些一般官吏和士人，所以隋郡县的许多官员都主动归附。窦建德军很快发展到 10 余万人。

称王建国

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郡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自立为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分治郡县。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冬至那天，窦建德在金城宫聚会文武官员，有五只大鸟降落在乐寿城，几万只鸟雀跟着飞来，整整过了一天才飞走，因此改取年号为五凤。有一个宗城人进献一枚玄王圭（黑色玉），景城丞孔德绍说：“古时夏禹亲受符命，上天赐给玄王圭。现在吉兆跟夏禹一样，应当称为夏国。”窦建德听从了这个建议，正式建立夏国。

立国之初，窦建德先后突袭盘踞在深泽县、拥兵十万人马的魏刀儿，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同年七月，大败隋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领 3 万幽、蓟精兵于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义收河间郡丞王琮。

此后，河北郡县争相归附于窦建德。

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擒杀宇文文化及于山东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选用隋朝官员，裴矩被任命为右仆射，定朝仪、制律令、兴文教，八月，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建立天子朝度，仍称夏王。

命陨虎牢

武德三年七月（公元 620 年），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郑王王世充。

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二月，窦建德率部击败三万精兵、攻克周

桥城、俘获孟海公，采纳中书舍人刘斌：“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谏言，答应王世充求援，亲率 10 余万大军，号称 30 万西援洛阳，行至虎牢关，被李世民设计生擒。

窦建德被俘后，其夫人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逃回洺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窦建德部下欲立建德养子为主，齐善行说：“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旧唐书·窦建德列传》）。遂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让其各自散去。然后齐善行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部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降唐。窦建德所建夏国，也就此灭亡。

武德三年七月十一日（公元 621 年 8 月 2 日），窦建德于长安遇害，时年 49 岁。

颜真卿

史兰芳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人称颜鲁公，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儒颜师古五世从孙。少孤，由母亲自训导。通经史，尤精《礼》学，事亲以孝。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正楷端雄伟，人称“颜体”，与柳公权兼称“颜柳”。（《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别号应方。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唐朝杰出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书法禀承家学，精妙雄秀，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是中唐时期的书法创新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很大。同时，颜真卿因为家学渊源，又善诗文，有《韵海镜源》、《礼乐集》、《吴兴集》、《庐陵集》、《临川集》，均佚，后宋人辑有《颜鲁公集》。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颜真卿中进士，曾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县城）任太守，时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后历任吏部尚书，御史大夫、冯翊太守、尚书右丞、太子太师，进爵鲁郡开国公，人称“颜鲁公”。784年（兴元元年），颜真卿奉诏前往劝谕叛将李希烈，因凛然拒贼，终被缢杀。他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德宗皇帝令将其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并亲颁痛诏废朝八日，举国悼念。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是以“义烈名于时”，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开元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因被杨国忠排斥，出为平原太守。（《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也。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事亲以孝闻。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东都畿采访判官，转侍御史、武部员外郎。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

公元709年（唐中宗景龙三年），颜真卿生于京兆府万年县敦化坊（颜氏家族本籍琅玕临沂，自颜之推起，已徙居京兆长安）。他家学渊源，五世祖颜之推曾写下著名的《颜氏家训》，曾祖辈的颜师古、颜勤礼，也都是文史留香的名师硕儒。伯父颜元孙、父亲颜惟贞都擅长书法。彼时的颜真卿三岁丧父，721年（开元九年七月），随母南下苏州，寄居外祖父家，于京师长安的福山寺就读。舅父殷践猷博学正直，对他关怀备至，教导有加。姑母颜真定、二兄颜允南也是博通经史、书法的学者。颜真卿就是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日渐成长起来的。

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颜真卿到吏部应试。

公元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二月），26岁的颜真卿于京兆府参加府试，被举选参加科试并一举以甲科举进士第。

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颜真卿再赴吏部接受栓选，又被选为甲等，提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

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任职两年后，母病逝，颜真卿辞职赴洛

阳丁忧三年。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颜真卿丁忧期满，回到长安，逢科举，参加“博学文词秀逸科”（制举考试的一种）的科制举考试，仍以甲等登科。同年十月，被任命为醴泉县尉，746年（天宝五年），三月，迁长安县尉。此时，颜真卿结识著名书法家张旭，并师从于他。之后颜真卿又曾任临川内史。据《云溪友议》所载：此期间“浇风莫竞，文政大行”颇受赞誉。再后来，又经两次提升，任监察御史，奉命巡查河东、陇州。颜真卿在巡视过程中平反了“五原冤狱”，受到百姓交口称赞；巡查河东时，“劾罢不孝的朔方县令郑延祚”，使其被朝廷下诏终身禁止录用。

公元749年（天宝八年），颜真卿升任殿中侍御史，因与宰相杨国忠“不睦”，遭其厌恶，被外调为东都采访判官。第二年，再任殿中侍御史。“调醴泉尉，再迁监察御史”（自《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44岁的颜真卿调任武部员外郎。是年他创作了《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与此同时，杨国忠把持朝政的野心急剧膨胀，被视为异己之患的颜真卿再次被贬出朝廷，于公元753年被调离京师，出任平原太守。

安禄山叛乱，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响应，被推为盟主。（《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安禄山逆状牙孽，真卿度必反，阳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壮，储廩实。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憺、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真卿恐摇人心，给诸将曰：“吾素识憺等，其首皆非是。”遂腰斩子光，密藏三首。异日，结刍续体，敛而祭，为位哭之，十七郡同日自归，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逆流千里的危机关头，早有准备的颜真卿独以一郡之力高举平叛大旗，堂兄颜杲卿立即奋起响应！颜杲卿时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杀了叛军将领李钦凑等人，清除了土门的敌人，十七个郡同一天自动归顺朝廷，推举颜真卿为盟主，有二十万兵力，截断了燕、赵的交通联络，赢得了战事的主动。安禄山见河北有失，急令史思明率领万余精兵围攻常山。颜杲卿率全城军兵与叛军激战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叛军纵兵屠城，颜氏一门死难30余口。噩耗传来，颜真卿悲痛万分。“安史之乱”给国家也给颜真卿个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极度悲愤中，颜真卿凝刻心魄，收掇血泪，写下了被公认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季明文稿》。在这篇草书手稿中，颜真卿把抑制不住的感情，倾泄在磅礴迅疾的笔墨中，由于不遑笔墨而一气呵成，枯笔极多，愈至后段愈加纵逸，不仅传达出书者的激烈情感，也记录了这场家国惨痛的历史悲剧。

历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奉诏前往劝谕，被希烈缢死。（《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李希烈僭称帝，使问仪式，对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覲耳。”遣将辛景臻、安华至其所，积薪于庭曰“不能屈节，当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使阉奴等害真卿，曰：“有诏。”真卿再拜。奴曰：“宜赐卿死。”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使人何日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骂曰：“乃逆贼耳，何诏云！”遂缢杀之，年七十六。子颀、硕护丧还，帝废朝五日，赠司徒，谥文忠。

公元759年（乾元二年），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后招致李辅国的厌恶，被降为蓬州长史。

公元 762 年（宝应元年），太子李豫即位，起用颜真卿为吏部侍郎。又授尚书右丞。

公元 764 年（广德二年正月），颜真卿留京主持尚书省事务，改封鲁郡公。之后，颜真卿掌管太庙事务，说祭器没有整治，元载认为他诽谤朝廷，将其贬为峡州别驾，后改任吉州司马。

公元 768 年（大历三年四月），颜真卿改任抚州刺史。后任湖州刺史。

公元 777 年（大历十二年），元载被杀，经宰相杨绾、常袞举荐，颜真卿获召入朝，担任刑部尚书，随后升任吏部尚书。

颜真卿为人一身正气，因而得罪权贵，屡遭弹劾，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唐肃宗至德二年，颜真卿被任为刑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公元 779 年（大历十四年），李豫驾崩，颜真卿重任礼仪使。宰相杨炎不喜欢生性耿直的颜真卿，被改为太子少师，仍兼礼仪使实为削弱他的实权。奸相卢杞掌权后，改授他为太子太师，罢免其礼仪使一职。之后千方百计想把颜真卿挤出朝廷。公元 783 年（建中四年），安禄山残部勾结成德、淄清、魏郡等地节度使，相继叛乱。宰相卢杞用计陷害颜真卿，进言德宗，派颜真卿用重臣元老的身份去说服李希烈，致使 76 岁高龄的颜真卿身陷叛逆，李希烈以死相逼，要颜真卿做伪宰相，遭到颜真卿的怒斥。李希烈攻占汴州，在大梁做了伪楚皇帝，颜真卿又被囚禁了一年多，至死不肯屈节于叛臣。在兴元元年八月三日被李希烈派人害死在汝州。颜真卿最终被奸臣陷害，逆臣谋杀。公元 784 年（兴元元年），李希烈攻陷汴州，自称大楚皇帝，派人向颜真卿请教即位仪式。颜真卿说：“老夫髦矣，曾掌一国礼”所记者诸侯朝勤（朝见天子）礼耳”。李希烈恼羞成怒，派人将颜真卿缢杀于龙兴寺，76 岁卒。

李之仪

李东筱

李之仪(1048~1127)北宋词人。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汉族，祖籍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县)。他是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李之仪早年师从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他一生官职并不显赫，但他与苏轼的文缘友情却流传至今。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和《姑溪题跋》二卷。其《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首为后世称道并广为传诵。

年少意气风发

为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北宋统治者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宋太祖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改善科举制度，吸引士人热衷科举功名。因此，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普遍存在于文人阶层。出身小官吏家庭的李之仪在这种大背景中，也怀揣成为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家的报复。

庆历八年(1048)，李之仪出生在楚州山阳，十岁就被送入学官读书。少年李之仪聪颖过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稍长，他拜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为师，深得范纯仁的厚爱，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其为人处世更是受到范纯仁的影响。经过十多年的辛苦攻读，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李之仪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四，真可谓少年得志。从他十岁入“学官”到进士及第这段时间，他一直抱有积极用世的心态，如他写的《回贺新及第》中：“才当数面，笔扫千军。早岁飞声，头角已竦于同队；青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卷十三)虽是赞美对方才气，但亦可视为李之仪的“夫

子自道”，意气风发之态跃然纸上。

李之仪登第后游宦四方，积极寻求用世。他先后在四明做僚属，在开封、万全做县令。虽然仅是一些地方小官，但并没有打消他从政的积极性。元丰四年（1081），他主动请缨从军鄜延，入折可适幕府，“元丰中，之仪在鄜延幕下，亲睹诏旨，观先帝所以规画必取之意，可谓深矣”（《折可适墓志铭》，《后集》卷二十）。在折可适幕下，李之仪主管驻军文字事宜，颇受知遇。随军三年，与折可适出生入死，结为生死之交。后来，李之仪也屡次自豪地提及在鄜延的生活。这段“铁马冰河”的从军经历也为他赢得了一次出使机会。元丰六年（1083），高丽王卒，杨景略为祭奠使，辟李之仪为书状官，之仪出使高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一载：“元丰六年十二月，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俗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诏赴中书试拟用书状进呈，吊慰潘辟官准此。’”从中可以看出，他“谙达吏方”，很有政治头脑。出使途中，路过山东长清县孝堂山汉石祠时，他曾题字于石祠的石柱上，大字楷书，共五行，现刻字尚存。这是他在山东留下的仅有的遗迹。故元祐二年（1087）李之仪被从边疆调回京城暂任翰林学士带知制诰。此后担任枢密院编修官近十年。总之，这一时期，他始终怀着一颗用世之心，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职，也曾得到上司和统治者的一些肯定，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中年仕途坎坷

当时的北宋政坛，“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之后，与高度封建集权相伴而生的政治腐败、军事无力和财政困难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造成了士大夫阶层无休止的党争，且愈演愈烈。如果说王安石变法初

期产生的新、旧党争还是由于政见不和、立场不同引发的进步与保守的观念之争的话，那么熙宁九年王安石再度罢相之后，就完全演变成了一种恶劣的权力之争、门户之斗，如苏轼所遭受的“乌台诗案”正是如此。这一切让李之仪灰心丧气，能给他带来心灵慰藉的就是与友人的交游唱和了。这一时期，早已与苏轼互通书问，已经踏进“苏门”的李之仪，越来越被文艺所吸引，也越来越多地将心思用在文艺上，醉心于诗文创作，开始追求儒家所说的“立言”之不朽了。

元祐八年（1093），苏轼帅中山（今河北定州），李之仪经苏轼引荐随其赴定州辅佐，那一年他四十六岁。在定州的日子可以说是李之仪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了，他与苏轼在处理政务之余，流连诗酒，击节起舞，作画题咏，尽情酬唱，更多地醉心于文艺之中，而有“苏李同时”之称。

可好景不长，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被贬岭南。五月，李之仪从定州回到京师，继续担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圣四年（1097），他被任命为原州（今宁夏固原）通判，虽仅为从八品，但“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第3947页），可见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此时李之仪已年届半百，少年时的满腔豪气早已荡然无存了，心态开始转向思考、探索人生的意义。在这种心态下，他在原州的日子百无聊赖。可是就连这样闲散的生活也不能长久，命运再一次把他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绍圣四年（1097）九月，李之仪任上入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记载：“绍圣四年九月，刑部言……勘官通判朝请郎李之仪，根勘鹵莽，李之仪特差替。”此案是由折可适擅自派人追敌（当时规定追敌不能超过一百里），致使伤亡一百三十三人引起的，折可适与有关将领被降职。而作为勘官的李之仪，因“根勘鹵莽”

也连坐。李之仪这样做并不是因折可适是昔日的上司而询私，而是因为他比较了解此案的前因后果。原来，折可适派先锋迫敌前，曾征得统制官王文振的同意和许可，但待追兵入坑谷迷失道路而有伤亡后，王文振为保全自己而先发制人，弹劾折可适，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诿得一干二净（此事详见《折公墓志铭》，《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二十）。李之仪见其中有冤情，于公于私都是要仗理直言的，便没有按照朝廷的意旨去审讯，因而被认为是“根勘卤莽”。

元符元年（1098），李之仪（时年五十二岁）从原州又回到了京城，任“监内香药库”，是去年九月出狱之后，即所谓“诏特差替”者。但随后的第二年，朝廷加大了对元佑党人的打压力度，苏轼及其门人都在劫难逃，李之仪也受到了株连。六月，因苏轼出守定州时，曾荐辟李之仪辅佐，李之仪以“为奸臣心腹之党”的罪名被放罢。这是李之仪第一次被贬，不过，他并没有被外放，只是被罢官。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徽宗想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被下放岭南的元祐大臣们陆续被赦北归，范纯仁及苏轼兄弟亦在其内。此时李之仪在颖昌（今河南许昌）为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之仪被召入京，除被任命为提举河东常平外，又兼任了“转漕河东”。经历了仕途挫折和生活磨难的考验之后，他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此时，范纯仁病重，自知不久于世，就把弟子李之仪叫到病榻前，由自己口授仪表（官员上奏朝廷的最后政治遗言），让李之仪笔录。就在这一年，范纯仁去世。李之仪怀着敬重之情，整理范纯仁遗表，又起草了行状（传记），详细介绍了范纯仁生前行迹及其功德，这也为日后的被贬埋下了祸根。也是在这一年的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因病逝世，这对李之仪无疑又是个沉重打击。李之仪与苏轼自元

丰三年（1080）结交以后，便书信往来不绝。自定州别后，李之仪一直渴望能再与苏轼相聚，谁知等到的确是苏轼离世的噩耗，悲痛之情可想而知。

崇宁元年（1102年），形势急转而下，打着新法幌子起家的奸臣蔡京擢升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主持朝政，极欲挟私报复元祐党人。这年六月，李之仪接到了要他回京的诏书，便匆匆赶往京师。谁知一入京门，便被逮进了御史狱，皆因他为范纯仁整理的仪表和行状所致。奸臣蔡京发现遗表中有“惟宣仁（指高太后）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顾。臣所惜者陛下上圣之姿，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等反对新法之语，十分恼怒，加之平素与范纯仁的儿子知谏院范正平多有仇隙，便趁机想借这个由头加罪于范正平。率性耿直的李之仪挺身而出，承认表文是自己代写的，与范正平无关，于是被下狱，遭到酷刑拷打，面临杀头灭顶之灾。幸亏其妻子胡文柔冒着生命危险，买通门卫，潜入范家，盗取范纯仁行状原稿，挺身上朝为李之仪申诉，李之仪才得以免除死罪，再加上家人的上下打点，李之仪被革职流放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这是他第二次被贬官。

就这样李之仪携妻子来到了当涂，这一年黄庭坚领太平州事，亦至当涂。李、黄二人为旧相识，共师苏轼，此时他乡遇故知，是二人宦海风波浮沉中最值得欣慰的一件事。二人同在当涂花园石洞听歌伎杨姝弹《履霜操》，这也是李之仪与杨姝的初遇（后期续娶杨姝为妻）。相逢后不久黄庭坚就调离了太平州，李之仪倍感孤寂，可没想到更大的悲苦在等着他。在当涂的第三年，因水土不服，一家人染病，爱妻，儿女，相继离世，李之仪痛不欲生。人到中年，丧妻丧子，癍疮遍体，心死身病，李之仪就这样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命运的巨大落差使李之仪心灰意冷，因其家临姑熟溪，便自号“姑溪居士”，埋首书卷，醉心禅学，一心一意做个方外之士。他还置办田产，亲自耕种，“踪迹出入，多在邻邑，或在田亩间”（《与龚平

国手简》，卷二十三），希望用努力的劳作来抚平心灵创伤。

晚年生活凄苦

正当李之仪安心做“姑溪老农”时，朝廷却又给了他一线从政的希望。崇宁五年（1106，五十九岁），李之仪复了官，并娶当涂歌伎杨姝为妻，育有儿女三人，其长子李尧光也得到荫封，李之仪准备安享晚年。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李之仪因一句无心之语，惹恼了心胸狭窄的文友郭祥正。郭祥正素知李之仪与蔡京有过节，为了报复，便指使他人上京城告状，说李之仪假冒得子以骗取荫封。在宋代，士大夫是不能与歌伎结婚的。也就是说，李之仪与杨姝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那么这个孩子是谁的，就说不清了。蔡京正愁找不到李之仪的把柄，这下好了，于是李之仪长子的荫封被取消，“令随母”，李之仪的家庭被活活拆散了。这还不算，李之仪因此事被再次除名，杨姝也被施以杖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九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成都府玉局观李之仪除名勒停”。此事给了李之仪很大的冲击，如果说前两次贬官仅是让他对仕途绝望的话，那么这次就让他对人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对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怀疑。

李之仪有才华有抱负，可险恶的政治风浪使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饱尝了比苏门其他文人更多的世态炎凉和人生忧患。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李之仪病卒，杨姝遵其遗愿，将其安葬在当涂藏云山脚，与前妻胡淑修葬在一起。自此，李之仪在当涂度过了他颇为凄苦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晚年。

邢侗

吴朝辉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自号啖面生、方山道民，晚号来禽济源山主、世尊称来禽夫子。山东省临邑县人，明代诗文家、书法家，明万历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太仆寺少卿。他一生为吏清廉，为民兴利除害，管至太仆少卿，一尘不染，深为百姓所爱戴；他善画，能诗文，工书。辞官回乡后，他乐善好施，苦练书法，造诣颇深，与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合称“晚明四大家”，有“南董北邢”之誉。关于他的故事传说，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

一、主要经历

邢侗于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出生于临邑县万柳村（今临邑镇邢柳行村）一个书香门第——邢如约家。邢如约平时乐善好施，被老百姓尊称“邢佛”，皇帝敕为“佛子”。邢如约四十岁得子，心花怒放，给儿子取名邢侗，字子愿。

邢侗七岁能作擘窠大书，龙飞凤舞、剑拔弩张、气势生动；十三岁作雅宜（王宠）楷书；十四岁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他写的正楷疏拓秀媚，亭亭天拔。济南府督学邹善见邢侗楷书道：“此儿书法有前辈风，是天下才也！”。

十七岁，济南府督学邹善召邢侗至济南泺源书院读书，亲自给他举行加冠礼仪式，当时传为齐中美谈。十八岁应诏进入北京太学院读书。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邢侗21岁，与自己的叔伯兄弟邢遵道一起赴京赶考，双双名落孙山。回到家乡后，更加刻苦读书。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邢侗24岁，再次与邢遵道进京赶考。这

一次，邢遵道落榜，邢侗考中进士。在皇帝听政的大殿上面试时，他引用沈度、王宠、赵子昂的文章数千句，一字不错。主考官于慎行慨叹：“子天下才，徐淮以北固无此。”后来，于慎行收邢侗为弟子，两人交好一生。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任南官（即河北省南官县）知县，任职五年期间，兴修学校，新建文昌阁，开辟玉带街。他定期亲自为南官读书人授课；奖励善举；提倡良好的风俗习惯，废除陋习；劝导百姓积极开荒。

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提升为监察御史，南官县人民流泪送行，敬称其为“邢父”，第二年自发集资为其修建“廉公祠”。

万历十一年（1583）奉旨巡察三吴（今苏州、常州、湖州一带），除掉张帮陵海盗团伙。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因政绩显著，升任陕西太仆寺少卿，官至四品。同年5月辞官归乡，时年36岁。归乡后，邢侗筑来禽馆等二十六景名“烁园”，他置身其中，攻读习书二十六年。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61年），邢侗手临王羲之《寒霜帖》，他精心挑选宋墨、陆氏笔、高丽纸。这次临摹是他第一次临王羲之的楷书，也是最后一次绝笔。

邢侗辞官后，斥资修建“来禽馆”，又无半亩良田，还时常接济穷人，以致家道中落，只能以卖书画维持生计。

邢侗归隐后，朝中按院和抚院数十次推荐他回朝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1612年，因病辞世。

二、趣闻佳话

（一）邢公泉

明朝万历三年（1575），邢侗到南官上任，一进南官地界，邢侗就弃

轿步行，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路上遇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在孙儿的搀扶下郁郁而行。邢侗上前问到“老人家，现在正是春播时节，为何不在家中种田呢？”

老汉说：“老天瞎了眼，不要这方百姓了，你看这地旱的，麦苗没吐穗就打了缕，火一点就着，谁还拿种子往火坑里扔？”邢侗说：“大家打井抗旱呀！”

老汉摇了摇头：“你说得轻巧，打井要买砖，眼下肚皮都填不饱，哪有钱打井呀！”

邢侗又说：“俭省一点，不可以先挖土井吗！”

“挖土井也不能一锹掘出水来呀！”老汉诉苦道，“那得有年轻力壮的人，可这些年京城里修宫殿，州县里建大堂，抓付出劳役闹得还有年轻人闲在家里吗？”

邢侗风尘仆仆赶到县衙，地方豪绅准备好的欢迎宴会他谢绝了，叫仆人戴禄传下话去，今天他没有事做也没有话说，衙内所有人员不用听班，可早早回去休息，夜深了，偌大的县衙内异常寂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颗愁肠百结的心，随着摇曳的烛光，忽明忽暗，一路凄凉的景象，重现眼前，老汉的话语萦绕耳边。他虽然是个读书人，可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知道种田的辛苦和农时的重要。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不及时抗旱播种，不仅麦季绝产，而且秋收无望，那么这方百姓岂不活活饿死？

上任伊始，邢侗一夜无眠。

次日一早，他拟出一张告示，鼓励百姓打井抗旱，规定挖一眼土井者，免劳役一月；打砖井一眼者，免田赋一斗。书吏把告示抄写多份，衙役四乡张贴。为带动百姓打井，邢侗特许县衙内所有人员放假十天，回乡率先

垂范，打井抗旱，不能完成任务者除名。这样一来，在百里南官县境，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热潮。几年之间，南官大地，水井星罗棋布，庄稼年年丰收，再无旱灾之虞。百姓饮水思源，感激一心为民的知县邢侗，就把这些井并称为邢公泉。

（二）邢侗对对子

邢侗辞官回乡后，应聘去武定府修志。州府大人设宴招待他，请了几位文人学士、地方名流作陪。席间，为了活跃气氛，州府大人除了上联：“三字同头左右友，三字同旁沽清酒；今日幸会左右友，聊表寸心沽清酒。”他让大家对下联，对不出的罚酒三杯。

这对子的构思奇特，字句重复的自然合理，很难应对，在场的人一个个被罚酒。轮到邢侗对了，他略一沉思，开口对道：“三字同头骂咒哭，三字同旁狼狗狐；人间声声骂咒哭，只因道多狼狗狐。”在场的人纷纷鼓掌，齐声叫好，唯独一个叫马拯的年轻人无动于衷的坐在那里，毫无表示。州府大人就问马拯：“子愿（邢侗字号）先生对得如何？”马拯躬身答道：“子愿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令人佩服。至于这对字嘛，不用我说，他自然心知肚明。”

邢侗微微一笑，拱手向马拯表示感谢，然后端起酒杯，诚心诚意地说：“我这下联，看似对的工整，其实不合章法。人家说‘三字同头’‘三字同旁’，我也完全照说，这那叫对子，不过是又做了上联而已。”说罢，自己罚酒三杯。

邢侗不爱虚荣、治学严谨的态度，得到了众人的赞许，特别令马拯敬佩。而这位做事认真、不随波逐流的马拯，也得到了邢侗的赏识。后来，经邢侗牵线搭桥，马拯与才女邢慈静喜结连理，成为邢侗的妹夫。

田雯

王婷婷

田雯（1635年7月7日——1704年3月28日），清初大臣，诗人。字紫纶，一字子纶，亦字纶霞，号漪亭，自号山姜子，晚号蒙斋。山东德州人，田绪宗之子。康熙三年（1664）殿试二甲第四名进士。授中书舍人，十九年（1680）提督江南学政，二十六年（1687）为江苏巡抚，三十八年（1699）奉旨督修淮安高安堰河工。以病辞职归里。诗与王士禛、施闰章同具盛名。著有《山姜诗选》、《古欢堂集》、《黔书》、《长河志籍考》等。

一、时代影响下积极入仕

田雯出生于明末，一生历经明清两代，主要活动在清代，顺康两朝。田雯出生在明崇祯八年乙亥 1635，出生时正是明末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农民起义，开始入陕。在田雯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农民起义，国内的统一战争一直在激烈进行，清除社会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斗争异常激烈。

德州在明末清初，虽然有幸平稳度过，没有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残，但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乱世之中，强盗恶人横行，天灾人祸不断。在《蒙斋年谱》中说的，田雯一生灾祸不断，多次被恶人强盗亲爱，无奈之下曾想要迁居道济南府去。

田雯生活的时期，处于新旧两朝更替之际，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但是新王朝的建立，又是风云初变的时代，国家的动荡对于田雯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时代的特殊原因，使得田雯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事外，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起伏，积极的入世成为他的必要选择。于是通过科

举考试积极走向仕途，心系百姓，又致使他为官清廉，所到之处皆有较好的政绩。而他从最底层走向高层的政治发展轨迹，使得他人人生经历丰富，生活是文学最好的老师，田雯的文学作品中很多都是离不开社会民生，因此，他的诗歌具有较为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密切联系生活，真实而内容丰富多彩，文以载道，是这个动荡的特殊时代的真实反应。有人评价田雯在文学创作方面，才雄笔大，就是因为他诗歌之中包含着时代性。

二、地域文化中的英才

山东素来是孔子的故乡，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博大的齐鲁文化，历史文化尤为灿烂。清初，德州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府，田雯的家乡是德州，也受到以孔孟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受到地域经济的影响，以山东西部古运河两岸为写作背景，诞生了两部著名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而古运河恰恰也流经德州，文化的繁荣，也深深地影响和推动了田雯的创作。曾经有人研究田雯和《桃花扇》之间的关系，戏剧研究的角度思考，田雯对《桃花扇》的创作和传播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对于清代戏剧的发展也贡献颇多。

文化的繁荣昌盛，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田雯在晚年曾经著有《长河志籍考》，对于德州的历史文物和景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包括现在较为熟知的董子读书台、董子祠、苏禄王坟等一大批人文景观，一个地区的文物标志着这个地区的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它是历史的再现。田雯多次将这些文物写入他的诗歌之中，例如，“亭是卢公吟杜地，家临董子读书台”，亭指的是杜亭，卢工公是指清代德州籍诗人卢世澹，酷爱杜诗，建此亭，自封为杜亭亭长。文化的兴盛，致使德州地区一批批文人考中了科举，走向了仕途之路，而田雯就属于这一批人中，在文学造诣和仕途发

展较为突出的代表。

三、学识渊博，著述丰富

与王士禛并称“齐鲁二贤”田雯不仅仅是清初政坛上的名臣，而且勤于笔耕，著述颇丰。

由于他“天资高迈”、“才雄笔下”，文学造诣颇深，又足迹遍南北，理政多蛮荒，阅历广泛，洞察民情，所以著作宏富，诗词文论俱全，且士、农、工、商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情、掌故无不涉猎，连缀成清初社会多姿多彩的风情画。

康熙十六年，主盟诗坛的王士禛选田雯与曹贞吉、谢重辉等诗为《十子诗略》，编订印刻，史称“金台十子”。

康熙十八年，京师地震，田雯写下著名的《移居诗》，其中因“墙脚残立山姜花”的句子，被人们称为“田山姜”。如今，在运河岸畔的田雯纪念馆中，依然设有一间书屋，名为“山姜书屋”。

康熙中期，田雯以超迈的天资、博洽的学问、纵横捭阖之气，崇尚雄伟奇丽，别辟门庭，与王士禛并称“齐鲁二贤”。现代学者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也说：“清初渔洋之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遵宋诗而推山谷者，则田山姜是也。”

田雯一生勤于笔耕，主要著作有《古欢堂诗集》《古欢堂文集》《长河志籍考》等等，大多收入《四库全书》，是清代的重要文献。其中，《长河志籍考》是田雯晚年献给故乡桑梓的方志巨著，以优美多样的语言，举凡德州的人文历史、名胜古迹等，以表达对故乡德州的深情厚谊。

田雯用诗歌将德州描绘得美妙绝伦：

鬲河之水流清渠，

数间茅屋城西隅。
桃花李花二月发，
落英满地如毳毼。
亭前老树缠风雨，
上覆檐溜枝扶疏。
故园景物颇清美，
行歌被酒真吾庐。

卢见曾

高文英

一、茁壮成长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十月十五，卢见曾（1690—1768），出生于德州卢家大院（今德城区解放路以东、勤奋街以北，芦家井街一带），为德州卢氏第十二代孙。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

明朝初年，卢氏家族于由直隶涑水迁至山东德州左卫，后代居此。卢见曾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知识分子家庭，其曾祖父卢世滋曾为明朝大学士；祖父卢裕为当时的秀才；父亲卢道悦于康熙九年（1670年）考中进士，曾任陕西陇西河南偃师知县，并写下《公馀漫草》《清福堂遗稿》等书。卢见曾出生时候，卢道悦已五十余岁，老来得，疼爱之余，卢道悦更是悉心教养。其生母王氏对其管教更是非常严格，对其养成谨慎好学积极上进的品格，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卢见曾自幼在其父卢道悦的熏陶下，四岁开始学习声韵，六岁既已通晓，而且能每天诵读千万言。九岁已通读九经，十三岁则拜在中州名儒高矩庵先生门下。从学两年打下坚实的经学根基。十五岁时，自河南偃师返回德州参加并通过了科举的第一道门——童子试，顺利进入德州州学，成为邑庠生（秀才）。在州学里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才冠州城。卢见曾在州学里开始与与州城学子交流论学，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田同之¹。两个人互相切磋学业，问学论道，互相砥砺。其父“尤善决人科第，百不失

¹ 田同之，字彦威，一字砚思，别字西圃，号在田，清中期山左诗学、词学的重要代表之一。田同之出身于德州文学世家——田氏家族，是山左文豪田雯之孙。自幼嗜书如命，不好玩耍，日诵数千言，人们都说有乃祖之风，因称之“小山姜”（田雯号山姜）。

一”对卢见曾的科举之路，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卢见曾经常游走于卢家世交谢氏、萧氏等名宦之家，得到了谢重辉、萧惟豫等名儒的赏识。山东学政黄叔琳²对卢见曾颇为赏识，收卢为徒并推荐他参加辛卯乡试。康熙五十年，卢见曾以五十四名的成绩秋闱胜出，荣登“桂榜”³，成为举人。第二年卢见曾拜于德州名儒田震⁴门下学诗，跟他学诗十余年，得到了渔洋、山姜诗学的精髓，对其诗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卢见曾一生对田震充满景仰感激之情。王士禛、田雯两位先生都读过卢见曾的诗，对他非常赞赏，断言“吾乡后起以诗名家者当在斯人。”

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卢见曾赴京参加会试，春闱胜出，荣登“杏榜”⁵殿试赐“进士出身”成为卢氏第四位进士，进入庶常馆（隶内弘文院，为新科进士深造之所），留京教习三年。卢见曾文才出众，性情豪放，尤其擅长与文人交友，在京学习期间广交四方名儒，与同年进士上蔡程元章，鄆县邵基，嘉禾钱陈群、海盐马为翰、宜兴楚雄文等惺惺相惜，互相砥砺，结成莫逆之交，激扬文字，一时名扬京城。

二、蹉跌仕途

雍正元年（1723）卢见曾在京教习三年期满，考核优等，以知县即用。次年，正式授四川洪雅知县。此时，卢见曾的父亲卢道悦已年过八旬，他以父亲年事已高，不宜远仕为由，想告归为老父养老送终。卢道悦听说后，急忙劝阻，说：自己的年纪虽大，但身体强壮，还没到行将就木的时候，让他以国事为重，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挂念老父亲。雍正三年（1725）

² 黄叔琳，字昆圃，直隶宛平人，是康熙辛未科探花，清代巨儒，世称北平黄先生。他在山东任学政其间，以兴贤育才为己任，并建白雪、松林两书院，发展当地文教事业。

³ 桂榜为乡试录取举人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桂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解（jiè）元。

⁴ 田震（mài），字子益，号乐园，又号香城居士，著名诗人，是清初文豪田雯的弟弟，他的诗有渔洋之风（王士禛号王渔洋）、山姜之气（田雯号山姜）。

⁵ 杏榜为会试录取贡士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会元。

秋卢见曾尊从父命带着生母王氏、妻子萧氏、儿子卢谦等离家南下赴川上任。他们出山东入河南，过河南南行，渡过黄河，路经河南偃师县。他的父亲卢道悦曾经任偃师知县，治理偃师十年，深得民心。离职后，偃师的父老在当地名胜浚溪寄胜亭为其父建生祠，每年都会祭祀。知道卢见曾途经此地，偃师父老争相带着酒食来给他送行，令他感慨万千。

雍正四年（1726）其父去世，卢见曾立即辞官，归心似箭。卢见曾虽上任不久，但他的治理才能得到了府、道长官的赏识，再加上洪雅治理刚开始见初效，恐怕会半途而废，都劝他延缓行程，众多乡民也到省里请求将他留下。卢见曾写了《留别洪雅士民》一诗以谢绝。卢见曾离任后，乡民感念他的恩德，把雅江书院的门楼定名为“雅雨楼”，以兹纪念。不久，生母王氏因伤心过度去世。第二年，嫡母程氏也因病去世。卢见曾在家居丧守制⁶，除了督促孩子们读书外，就是研习王士禛、田雯的诗学，深得两位先生的诗学要旨。

雍正九年（1731），卢见曾守丧期满除服，补安徽蒙城知县。卢见曾一向具有治理才能，上任后两月，县务便全面理顺，秩序井然。两江总督高其倬非常赏识卢见曾的吏才，又因为亳州知州不作为，仅两月后，特命卢见曾兼理亳州州务兼办赈灾事务；四个月后擢升六安州知州。在任三年，有很多惠民的政策，离开的时候，州人扶老携幼攀辕⁷追送数十里，授业诸生更是并缆连樯⁸送至淝河。卢见曾与众人作诗留别，集成《饮贤饯别记存集》（已佚）后来，六安人建祠刊志，以示感念。

雍正十二年（1734）六月，调任亳州知州。十三年（1735）三月擢升安徽庐州府知府，并被委任代理凤阳府。秋季，调升为江南江宁知府，九

6 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能任官、应考、嫁娶等

7 攀辕：拉住车辕。成语攀辕卧辙，意思是拉住车辕，躺在车道上，不让车走。旧时用作挽留好官的谀词。

8 并缆连樯 并缆：缆绳相并 连樯：桅杆相连。形容船多。

月又调任安徽颍州府知府；在颍州待了八个月后，又于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擢升江西广饶九南道。安徽巡抚赵国林奏请“以生銜暂留颍州，办理通省大案”，事情处理完后，才赶赴江西上任。上任不到百日，又升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在此任上不到一年，因整顿盐务，被盐商诬告结党，被罢官羁押。此案先后查了三年之久，所列尽属子虚乌有。但有人还是不想放过卢见曾，说他在扬州不思悔过，整日游山玩水，沽名钓誉。于是，在乾隆五年（1740），卢见曾被充军发配到塞外二十五军台充军三年。

乾隆八年（1743）冬，54岁的卢见曾被赐还，结束了三年的塞外流放。第二年二月发往直隶省，以知州待用。六月补任滦州知州，在任一年，政绩斐然。再一年，擢升永平府（治今河北省秦皇岛卢龙县）知府。乾隆十六年（1751）62岁的卢见曾奉旨升迁长芦盐运使，到天津赴任。十八年（1753）复调两淮盐运使，赶赴扬州，第二次主持东南盐务。二十八年（1763）73岁的卢见曾致仕还乡。乾隆三十年（1765），皇帝第四次南巡经过德州时，特意亲自书写了“德水耆英”的匾额赐给他，这是卢见曾一生最大的荣耀，也是对卢见曾一生杰出成就的肯定。三年后，两淮盐引案发，卢家被抄，78岁的卢见曾被捕入狱，死于狱中。三年后（1771），大学士刘统勋在奏书上详细列举了卢见曾兴修水利，以及为灶户收回盐地所有权等造福百姓的业绩，指明贪官污吏和不法商贩的不实之词，为卢见曾昭雪。

宋哲元

宋晓丽

宋哲元(公元1885年-1940年)，字明轩，山东省武定府乐陵县（今山东省德州市乐陵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

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廿三日），宋哲元出生在乐陵西北城关镇赵洪都村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庭，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开始识字，在父亲、舅父指导下熟读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等。14岁随父来到北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广泛涉猎了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及管子、晏子、诸葛亮、岳飞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伟绩，萌发了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志向。直到1900年秋天，在北京的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宋哲元被迫失学返乡。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感受到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与耻辱，报国御侮、保国为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此扎根在心中。

1906年，宋哲元投笔从戎，考入北洋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服役于冯玉祥部，先后担任连、营、团、旅、师、军长、方面军总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军职，并曾先后任陕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辖热河、察哈尔、河北三省，北平、天津两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集军政要职于一身，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抗日爱国将领。

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宋哲元率残部退往晋南，饱尝地盘丧失的苦楚，寄人篱下的辛酸，决心要为二十九军争得一个容身发展的环境和施展抱负的地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三省，热河告急，天津震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醒了宋哲元及二十

九军的抗日民族意识，同时也为宋哲元脱离困境，从民族斗争的激流中寻求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宋哲元率部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宋哲元率同部下七名将领请缨抗日，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响后，二十九军战士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夜战、近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三千余人，力挫了侵略者的凶焰。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本报纸宣称：“明治大帝起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天津《益世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十九路军淞沪一仗，使世界认识了中国人；二十九军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做人。”天津《益世报》还以《喜峰口的英雄》为题发表评论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的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引自人民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官兵发出了“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誓与桥共存亡”的誓言，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全歼进攻卢沟桥日军一百余人。28日拂晓，日军以备战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攻，激战二十昼夜，我军付出重大牺牲。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宋哲元惊闻噩耗大哭曰：“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充分表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英雄气概。

北平失陷后，二十九军退守河间，宋到河间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修建“昭忠祠”，并在祠前对官兵慷慨激昂地训话说：“咱们是一贯抗日的队伍，现在又跟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了。我们绝不允许再演‘九·一八’事件，决不做亡国奴，我们要给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报仇，我们要下决心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1938年9月宋哲元突患肝病，后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恶化。宋哲元卸职养病期间，时时思念旧部，尤为怀念情同手足而为国捐躯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他入南岳后，于1938年10月，在衡山半山风景秀丽的明镜台侧建造“双忠亭”，并亲自为两将军撰写了碑铭。

1940年3月26日，宋哲元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宋哲元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报国素志”，筹划抗日大计，再次勸勉旧部诸将“努力破敌”，并坚信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操胜券”。其御侮救国之宏心，终生不渝，抗战必胜之信心，至死坚定。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

宋哲元逝世后，举国震惊。以其英勇抗战，功勋卓著，政府与人民，国共两党、军政两界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平生事迹宣付国史，追赠一级上将”，并复令秦德纯奔赴绵阳主持治丧。四月十七日，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国民党元

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碑文。治丧期间，收到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抗日部队指挥官，中国共产党及全国各界代表、知名人士、宋旧部及亲属挽幛、祭文、挽诗、挽联数百幅。其中，周恩来挽曰：失地收未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朱德、彭德怀挽曰：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文化大革命”中，宋哲元陵墓一度遭到破坏，当地群众将棺木转移暗藏在崖洞，一直保存了十年。1979年3月，宋哲元陵墓重修完成。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宋哲元为抗日爱国将领。

1987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及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纪念“七七”事变爆发五十周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卢沟桥畔隆重举行，邓小平题写了馆名，万里、王震为纪念碑剪彩揭幕。纪念馆内陈列有宋哲元用过的指挥刀和一些抗战图片、实物等，纪念馆现已被国家定为爱国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2002年，宋哲元的故乡山东省乐陵市为他立了铜像。2005年9月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赠予宋哲元亲属抗日英雄纪念章。

任继愈

高天宇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其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现代哲学家、宗教学家。山东省平原县平原镇北任庄人。先后入天津南洋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

他治学勤奋，造诣深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哲学研究人才，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学术论著百余种，主持《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多项重大文化工程。

小荷才露尖尖角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中等家庭。任家祖上曾经也属殷实富裕之家，但任继愈祖父在和几个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败，而致家道中落。任继愈的父亲任箫亭出于经济考虑，报考了费用较低的保定军官学校，后来官至少将，但由于生性耿直，不畏权贵，一直被国民党嫡系部队视为“异己”。1954年，他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到张自忠的部队，参加了抵御日军的“老河口战役”，之后转任参议闲职。任氏家族，四代同堂，是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后来任继愈一家搬离大家族，任父远在外地从军，任母独自担负起家庭重担。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平日非常严格、节俭的母亲，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她将孩子送去学堂读书，孩子们需要购买的报纸书籍，她也从不犹豫。

由于在小学打下的良好基础，且坚持着认真专一的读书态度，任继愈的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喜欢读书，喜欢文学，喜欢那些让人默默深

思、频频颌首的哲理和道理。任继愈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三年学习生活，对他的性格、阅历和知识的培养历练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也坚定地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目标。1934年，他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期间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哲学研究大家，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北平成了边城。在当时严酷的时局和动荡的生活、学习中，任继愈更加理解了古代圣人、哲人、贤人，无不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更加理解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而要研究哲学，就必须和积贫积弱的国家结合起来，和探究贫苦大众的出路结合起来。哲学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活着的文化。然而，还未等他学成毕业，日军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进攻北平。从1937年6月开始，驻丰台日军经常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制造战争气氛。国难当头，任继愈等一众学生奔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西迁的北大、清华、南开3所高校组成的临时大学），他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1941年，任继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这里学习和工作，度过了长达七八年的青春时光。

授业北大，激昂文字挥斥方遒

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蒋介石委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从美国归来，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任继愈与夫人冯钟芸也已经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大。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在西山的夕阳剪影，

成为他们一生魂绕梦牵的精神家园。

崭新的生活画卷在任继愈面前展开，欣喜之余，他开始对这幅画卷进行如痴如醉的研读。不料想，不久之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灭。

内战再次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继愈在沙滩红楼虽有一间住房兼书房，却也读不下书去。这几年，任继愈说他感觉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方面，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他的心情一直比较苦闷，直到解放后才有所好转。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有一天，北京大学校长室进来一名学生，对胡校长说，解放区的延安广播电台昨天夜里专门对他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请他担任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偌大的总统号，只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老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的心情，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一同度过了一个个兴奋狂欢、令人鼓舞的日子。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再加上清华文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可谓群英荟萃，俨然西南联大文科力量的大本营。

从1942年到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大哲学系，先后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

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当时的学术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仿佛脱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浑身也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成为奇观的胜景，让任继愈不由得陶醉其中。这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北大图书馆中的满架图书，借着书香墨迹，脑中萦绕的是乘着大好时光，像自己西南联大那些无私无畏的老师们一样，为国家、为北大多尽绵力的理想。

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在那时入了党，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为新中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们的信念。也是从那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少壮工夫终始成

1963年，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中国国际地位在提高，国际上重视研究中国，我们也应当了解外国，建立一些研究所。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了这份文件。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众多研究所里，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主持筹备并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研究所当时设在北大，时年48岁的任继愈出任所长。工作开展以后，研究所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任继愈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宗教研究所同事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78年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87年。从1964年受命组建宗教研究所，任

继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经工作了 20 多年。同年，任继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被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从此坐拥书城，传播知识与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这一年，任继愈 71 岁。

1987 年至 2005 年，任继愈任国图馆长期间，始终作为学术界代表，研究宗教学、哲学，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他曾当选第四、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1999 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09 年 7 月 11 日 4 时 30 分，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 93 岁。